

## 百年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与“四史”教育<sup>\*</sup>

梁 怡

[摘 要]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都有交集,互为补充。将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成果用于“四史”的学习教育中,可以拓展研究视角,扩大研究范围,增加研究功能,也能很好地体现中国学研究在保证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为树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良好、真实的国际形象作出实际的努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20 世纪 21 世纪 四史 国际形象

20 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远赴苏俄(苏联)、法国、日本等国家,踏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初心之旅。自此,国外的关注和研究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紧密相连。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四史”的内容在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中都有反映。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学习“四史”的问题,并将学党史放在学“四史”的首位,其战略意义深远。他要求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主线,体现和展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因此,系统挖掘整理与四史研究相关的国外文献资料,不仅对我们梳理过往积累的相关学术资料有益,而且对总结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经验,规划 2021~2050 年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工作,开展好“四史”的学习教育都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背景下树立中国真实的国际形象也有积极作用。

### 一、拓展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视野

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是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客观存在,是国内学界对国外研究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史成果的再研究,亦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特殊视角和有益补充,有很强的时代性、政治性、史料性。其与常规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有所不同。一方面要眼光向外,以域外中国学为研究对象,把已开展研究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状况(缘起、著述、观点、意义等)进行历史考察、动态追踪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要眼光向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宏观把握各国研究中国共产

<sup>\*</sup> 本文系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重点课题“国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评析”(SDQDSK1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史的进程和特点，并对其研究背景和学术价值作出分析判断，对其使用的文献资料及代表性的著述作出综述性和专题性的评析，从文献收集、系统梳理、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好基础性工作。

### （一）拓展的视角和范围

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属于专史研究。如果将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四史”教育，要求研究者在立足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对与“四史”相关的内容也必须熟悉。这包括对“四史”的研究状况要有基本的了解，尽可能多地掌握多门外语，对国外解密档案的情况、“四史”研究情况的追踪要及时紧密，对研究的对象国及主要学者的情况要熟悉。

就国别而言，不同国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起点时间、研究阶段划分是不一样的。除了美国、苏-俄、日本三个主要的研究国别之外，对亚非拉的研究情况要有基本的了解。本人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对有前期研究基础的国别作了初步的梳理，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但现在国际局势的变化要求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国别和范围。比如，对亚洲的朝鲜、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一些有相关研究的国家的情况，也都需要有所关注，开展具体的文献搜集、整理和评析。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与其他“三史”之间有内容相近、资料互为补充的空间和可能，因此，扩大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范围有积极的意义。

就学科而言，中国学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一般来说，凡是国外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都在中国学关注的范围内。然而，关注解说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关注研究“四史”相关情况的国外人士更是无法按我们的学科分类对应查找。可以说，国外学者、政客、智库乃至普通人，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基本都有，面广且泛，有些资料与我们的研究和学习教育有关。因此，我们的研究也需要关注不同学科及其领域中的研究成果。

因此，要力争达到以下五个目标：一是力争使研究做到学术梳理与政治标准兼备；二是力争尽可能详细而全面地展示国外“四史”研究的状况和全貌；三是力争客观评述其研究的资料和成果；四是既要力争准确总结出“四史”中带有统一性的研究特点和规律，也要力争准确总结出国外“四史”研究各自的研究特点和规律；五是力争较好地为中国学者查寻、利用国外研究的相关资料提供便利。

### （二）处理好两个研究视角的辩证关系

无论是“四史”还是党史都存在以两个研究视角看问题的情况，这是两个研究定向的问题，含有对立统一关系。既有处理好党史学习研究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也有处理好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对四史学习教育的辐射问题。

一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域外，开展以党史带“四史”的特色中国学研究。过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也形成了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国外“四史”研究的情况，把中国学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四史”，对结合多学科背景开展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不仅有很好的补充拓展作用，也能为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积极的参考，为解决目前内外宣传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作出实际贡献。二是要立足国内开展以党史为中心的“四史”学习研究的立场和原则。用好国外研究文献的补遗、佐证作用，对国外研究中有关污蔑或妖魔化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的观点予以驳斥，对误传误用的资料予以有凭有据的澄清等。在文献汇集后，做好系统梳理、分类、分析工作，形成完整的资料汇集和文献积蓄。在此基础上，为集中建设国外“四史”研究数据库做准备，为发现新史料、阐释新观点提供信息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四史”研究和利用的标准是这项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建议以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权威著作作为研究框架和叙事标准。在此基础上，对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析，以体现中国学研究在保证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在研究中，要在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处理好国外“四史”研究要以党史为主线、主轴的问题。对国外有关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研究成果给予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外搞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开展国外研究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于此，将有助于以党史为中心的“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有助于提升“四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国际学术话语中的主动权，有助于提升讲好真实中国故事的针对性，有助于设计2021~2050年国外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总体规划，为树立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作政治和学术支撑。

## 二、拓展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功能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外始终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和研究。百年来，国外在发现、解密和编辑出版相关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俄罗斯和德国合作、陆续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集、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和补集）等，对国内党史研究起到一定的补充佐证作用。国外出版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著作、刊物、论文数量庞大，但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加之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出现了大量否定、贬损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这需要我们结合时代背景、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及其政治倾向作出清晰判断和系统整理。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俄（1917~1922）、苏联（1922~1943）、俄共（布）（1918~1925）、联共（布）（1925~1952）和共产国际（1919~1943）以及日本多因革命或战争的需要而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同时，一批批中国的进步青年艰苦跋涉远赴国外寻找真理，留下大量可歌可泣的事例和丰富的历史档案。总体而言，这段时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性文献、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多于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形成。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创立“现代中国学”，带动了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开启以研究现实中国问题为主、且带有鲜明冷战思维的研究模式。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出版了第一部专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英国创办了第一个研究新中国的刊物《中国季刊》。从此，西方走上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学术化研究之路。但受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干扰，在一段时期内，在

一手资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充满偏见,出现很多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否定中国社会进步的观点,造成了中国学不良的学术环境,至今还在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科学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吸引着世界目光,澳大利亚等国家出现了以研究当代中国为主的机构和《中国研究》等刊物<sup>①</sup>。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国别、机构、学者数量、相关研究成果大幅增加。20世纪90年代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进入高峰期。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斯图亚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毛泽东的思想》、尼克·奈特(Nick Knight)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等译著和学者的论文、观点摘介在国内陆续涌现。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外中国学界原本浓重的冷战色彩更加浓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前途遭到质疑,中国取得的成就被贴上各种贬义的标签。

21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便利了国外人士到中国实地考察,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更快的发展并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些学者出版了较为客观的著作。其中,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起了重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作用。党的十九大后,国外关注、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再次进入高潮。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领域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四种新趋势:重温经典,寻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观察中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新的发展机遇、新的合作方式;关注习近平,了解中国的治国理政的新战略;分析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国际领导力量。

中国学研究功能分两个方面:翻译、编译、译介、评介、述评、评析几个层次和近些年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开放程度的逐步扩大为中外学术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宣传、国际传播重要论述的指导和推动下,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准确理解中国方案、道路、制度、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学研究领域需要重视的新功能。许多部门都在积极推进讲好中国故事的工作。但是,如果将外宣简化表述为“讲故事”,还存在较多问题和不足:一是宣讲者缺乏对外国人关注中国时历史背景的准确了解;二是讲故事的针对性不强,规范性不周,主要是对讲故事的重点和针对性的选择不清楚;三是各部门各讲各的故事,顶层设计不够到位。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外国人不一定认同中国共产党,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否定、诬蔑中国共产党的。二是有些研究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只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采用他们的学术观点时需要辨别。如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与外国人侧重把个人研究表述为毛泽东的思想有本质的不同;有的人引用原文的版本是外国人翻译的毛泽东的文章,译文的准确性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三是有的人是学术投机主义者,在不同年代的著述中其政治观点表述不同,前后变化

<sup>①</sup> 影响较大的外刊主要有:俄罗斯期刊《远东问题》、日本期刊《中国研究月报》、美国期刊《当代中国研究》、英国期刊《中国季刊》、澳大利亚期刊《中国研究》,等等。

很大。四是有的学者治学严谨，如施拉姆、迈斯纳、奈特等，他们根据新解密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及时修正了自己早期不准确的研究观点，引用时需要辨认版本的时间。总之，选取国外学者观点时需要了解其学术和政治背景后再使用，特别是策划讲中国共产党党史故事需要加强针对性，要先结合形势变化找出国外研究中突出的亮点和污点，也需要使用外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

作为以中国学研究为职业的研究者，要积极发现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新史料，正确阐释新观点，向国际社会推出可以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实际成果，为主动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支撑，助力相关部门准确切入讲故事的话题，把掌握和提升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落在实处。我们特别需要通过梳理出的针对性建议，解决内外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 三、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对象

1949年以来，国内对外部情况的同步追踪和分析一直从未间断。但是，受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的限制，研究成果数量有限。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史专业学者和高校教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学术敏感对否定、贬损中国共产党的突出问题予以辨析，发表了重要译著、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只是在初期起步的一段时间里，数量仍比较有限，多在翻译、评介、内参层面。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行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系列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了《国外近代史研究》等，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相关的译著、论文陆续可见。张注洪、金春明、侯且岸、马贵凡、张会才、李向前、何培忠、朱政惠等学者持续追踪学术前沿。自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科研课题《国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历史考察》，张注洪先生开启了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相关的专题研究。金春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九五”课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集中了国史、党史的权威专家作了评析性研究，这是中国学研究中最高层级的成果。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九五”课题及同名成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初步搭建了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分析框架。到2020年，相关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出版高质量研究专著数十部，论文数百篇，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相关的国家级项目近30个<sup>①</sup>，其中吕彤邻、张德军等学者从断代、国别等专史角度完成了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相关的项目。2019年，周一平获批了《中共党史史学史（1921~2021）》，但遗憾的是不包括国外研究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梳理以国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为核心的国外“四史”研究，或将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本身看，其研究对象属于对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发生、发展全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研究分析外部看中国共产党党史是其中一个独特且重要的领域，包括分析国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对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情况，特别是1949年以来与中国密切相关内容，也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等世界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的内容。

<sup>①</sup> 梁怡、杜意娜《新中国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进程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在世界社会主义 500 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是重要政治力量。中国人是从 1917 年前后开始关注和追随社会主义的，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杨明斋等早期党史人物，在 1921 年正式建党前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积极、最重要的中国参与者。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 1949 年成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与苏联社会主义等进步力量一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1949 年后的新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有生力量，坚定地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时，中国准确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相当大程度地扭转了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所处的被动局面。当前，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同时也为世界贡献了国家治理经验和现代化建设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旗帜。“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方向。

总之，对国外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在内的“四史”的研究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树立正确党史观。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体系为依据，选取国外有代表性、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和研究价值的史家、史著、典型性学术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运用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流变作梳理和学理性分析。对百年间国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相关机构、基金会、流派、史学思想、理论、方法、范式作系统分类、分析。三是开展比较研究，既作国外研究“四史”内容的比较研究，也作国外与国内“四史”研究情况之间的比较研究。在此过程中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用于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世界反帝反殖革命斗争史、国际关系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多学科和专门史的相关教学和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这是党中央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配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为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国内宣传教育和国际传播，我们不仅要系统梳理百年来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发展状况、总结其研究的特点和规律、吸收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也要将研究视野、范围、功能、对象扩展至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回应国际学术界的关切，从理论上打破西方主导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掌握中国共产党及相关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为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作出实际的努力。

(梁怡系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小欢]

grasping the 100 – year history of CPC with the grand historical view. Specifically , the book connects the history of CPC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ccurately grasps the them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100 – year history of CPC; it scientifically analyzes the continuity and stages of the 100 – year history of CPC; it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world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Yang Jun ( 32)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statements , new judgments and new summarization on the basic issues of the CPC history. For example , he presents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at the history of CPC is a “history of carrying out the Party’s initial mission”; he summarizes the essence of the CPC history as the entire cause of continuous struggl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explicates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entire history of preparing for , initiat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 st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world and its value to human civilization; he explains the spiritual line and red gen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e outlines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CPC; and he sums up the historic achievements of CPC’s unremitting struggle. Thus , an innovativ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PC history is formed that covers the Party’s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 historical direction , historical main line , historical mainstream , historical essence , historical experience , historical conclusions ,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 and spiritual line.

**On the Zhaojin Spirit and Its Value Today** ..... Chen Jianbo ( 43)

The Zhaojin spirit is a revolutionary spirit that was 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Shaanxi-Gansu border revolutionary base centered on Zhaojin , and later the Shaanxi-Gansu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by outstanding Chinese Communists such as Liu Zhidan , Xie Zichang , and Xi Zhongxun. It mainly includes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t struggle , heroism that has no fear for sacrifice , perseverance in remaining loyal to the Party , and a working style of dedicating to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we should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Zhaojin spirit , and continue to win new victories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Education concerning the Histories of the Party ,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Reform and Opening-up ,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China** ..... Liang Yi ( 53)

Foreig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synchronic with the Party’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ey have overlapped and are related to four histories—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s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fruits of foreig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in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the four histories , which will help broaden our vision , expand the scope , and add new features in our research. It can also reflect the special role of China studies in ensur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security , and make practical contribution to establishing a positive and authentic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